

石破茂内阁执政后，表现出改善对华关系的积极意愿。11月15日，在秘鲁利马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习近平主席会见石破茂，双方就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对外发出积极信号，给两国关系注入了新的政治动能。此后，中日防长举行会晤，日本外相岩屋毅拟在年底前访华，使中日关系

在日本内阁更迭后实现良好开局。

与此同时，中日民间交流加速回暖。2024年1至10月，中国（大陆）赴日游客人数达到583万人次，已恢复至新冠疫情前最高峰时80%的水平。日本来华人数也较2023年翻倍。11月30日起，中国恢复对日本公民短期来华免签政策，受到日本各界广泛欢迎，有望推动双边人员交往持续扩大，双向交流更趋平衡。

但另一方面，日本国内对华

认知和战略思维依然较为负面消极，围绕涉台、涉海等问题对华政策消极面突出。日本政府积极配合美国推动“去中国化”的“小院高墙”布局，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企对华合作热情。2024年日本对华贸易额可能被韩国反超，失去中国第二大贸易对象国地位。总的看，中日关系依然面临政治安全互信缺失、经贸合作动能减弱、国民感情欠佳等多重挑战，要实现全面改善发展依然任重道远。

东南亚：凝聚高质量合作，与中国携手应对挑战

张洁（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2024年，在全球局势持续动荡不安的背景下，东南亚地区整体发展态势良好，各国政局基本平稳，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以“增强互联互通和韧性”为年度主题，东盟致力于推进区域合作，其“中心地位”受到各国普遍认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良好，时至年末首脑外交再掀热潮，彰显了彼此高水平关系的发展。但也应看到，因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频频挑衅，中菲关系陷入低谷，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友好关系中的不和谐音。为应对特朗普重新上台后可能出现的变数，中国与东盟国家应继续加强战略互信，聚焦区域合作，壮大和平稳定的力量。

多国政权交替平稳，多元化产业发展迅速

2024年，东南亚多国经历政权更替。在新加坡，黄循财接替李显龙出任总理，成为该国第四代领导人。在印尼，普拉博沃高票当选新一届总统，执政初期对内以延续佐科政府的既定方针为主，对外则展现出积极进取态势。在越南，苏林当选越共中央总书记，此后领导层“四驾马车”的基本格局逐步恢复。在泰国，经过激烈博弈，他信的小女儿佩通坦出任总理。总体来看，东南亚各国政权实现平稳交替，内政外交路线具有连贯性，这为东南亚整体上保持地区稳定、推进区域合作奠定良好基础。

根据相关机构预测，2024年

东南亚地区经济增长在4.5%~5.0%之间，这反映出东南亚经济持续复苏和扩张的趋势，其中，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增速明显。在产业发展方面，东南亚各国的制造业整体向好，旅游业持续复苏，特别是数字经济发展迅速，预计将同比增长15%，清洁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的投资增长也较快，有望为东南亚经济带来新的增长点。

东盟“中心地位”受认可，安全协调能力待提升

2024年，老挝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以“东盟：加强联通和韧性”为年度主题，协调各成员国就东盟组织未来发展达成广泛共识，包括通过一体化经济

加强联通性，共同打造包容、可持续性发展的未来，向数字时代转型，以及通过支持东盟共同体2024愿景及其战略计划以强化东盟韧性，加强东盟“中心地位”，等等。可以看出，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仍然是东盟的核心议程，而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在10月顺利举行也标志着域内外国家对这一核心议程的支持，以及对东盟“中心地位”的认可。

但是，正如不少国际媒体所关注的，东盟仍面临如何妥善处理本地区安全热点的挑战。首先是缅甸问题。缅甸国内社会经济发展停滞，2024年面临严重的自然灾害以及不断恶化的难民问题，其国内战事更是趋于激烈，受到域内外国家广泛关注。东盟虽在2021年针对缅甸问题提出“五点共识”，但始终未被缅甸军政府接受，东盟各国也存在意见分歧，这导致东盟的地区领导力受到质疑。

此外，菲律宾围绕南海问题不仅在双边层面频频挑衅中国，而且试图借用东盟平台对华施压。对此，东盟峰会联合声明中指出，东盟对南海问题进行了讨论，强调各方需要加强互信，展现自我克制，避免争议升级以及形势进一步复杂化，各方还应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等等。在实践中，东盟国家与中国持续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致力于努力维护南海地区的稳定。

中国与东盟合作面更加突出

2024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稳中有进，经济合作成果丰富。首先，元首外交再掀高潮，引领双边关系深入发展。根据不完全统计，年内中国与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实现领导人多次会晤。这一方面得益于良好的双边关系，如印尼、越南、马来西亚与中国实现领导人互访，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候任期内和就任后不久两次访华，就构建具有地区 and 全球影响力的命运共同体与中方达成重要共识。另一方面，长期形成的区域、次区域对话机制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双边会晤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便利。10月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李强总理会晤了东盟多国领导人

并顺访老挝、越南。11月澜湄合作会议期间，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领导人均来华出席会议。

东南亚地区始终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发展方向，也是区域合作成果最丰富的地区。2024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互联互通领域取得新进展，雅万高铁正式开通一年，累计发送旅客超600万人次。中老铁路客货两旺，持续释放黄金大通道效应。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建设稳步推进，中老泰国际货物列车正式开行。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谈判实质性结束。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质生产力领域正在成为中国与多数东南亚国家拓展合作的新空间。

总体而言，聚焦区域经济合



2024年10月9日至11日，第44和45届东盟峰会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峰会主题为“东盟：加强联通和韧性”。图为10月9日，东盟领导人出席在万象国家会议中心举行的第44届东盟峰会全体会议。

作仍然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最大共识，中国与主要东南亚国家正在新的产业革命与技术革命中形成深度合作与良性竞争态势。同时，中国与东盟国家能够正视涉海分歧，通过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保持战略沟通，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特朗普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获胜后，多数东南亚国家既担心美国进一步加大对华全面战略竞争会波及自身，导致其难以在

中美之间保持平衡，又担心特朗普政府重新采取单边主义与“美国优先”，向东南亚各国举起征收关税的“大旗”，破坏本国经济发展。为此，各国一方面努力与特朗普团队建立联系，另一方面也试图通过外交多元化，对冲特朗普执政带来的影响乃至风险。

2024年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2025年是万隆会议举行70周年，也是中国与印尼

建交75周年，与泰国、菲律宾建交50周年，面对共同的挑战，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应共同弘扬以和平、合作、包容、融合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赋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万隆精神”新内涵，不仅坚持“双轨思路”推进合作，而且随着更多东南亚国家加入二十国集团，各方应在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上协力推进全球南方合作，为地区与全球的和平稳定注入正能量。

南亚：动荡、转型和调整不断深化

王旭（北京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2024年，南亚多国举行大选，更新内政生态，带动地区内外局势调整。总体来看，多重转型、动荡和调整相交织，是2024年南亚形势最突出特点。

域内外转型作用叠加，加深地区动荡

美印关系进一步向“利益之交”转型是加深地区动荡的最主要外因。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日益将印度视作“利益之交”而非“价值观趋同国家”，两国围绕南亚领导权分歧日益增多。进入本世纪，“扶印制华”逐渐成为美国经略南亚“大战略”，但“扶印”只是手段，“制华”

才是目标，美国难以容忍南亚主导权旁落。因此，拜登政府极力拉拢印度融入其盟伴体系和供应链体系，但不时挥舞“价值观大棒”敲打印“民主人权”问题；同时，加紧介入南亚事务，利用地区中小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加强地区渗透，进一步挤压印度版“门罗主义”空间。2024年6~8月，孟加拉国“反配额制”运动冲垮连续执政15年的哈西娜政府，被认为是2024年美国在南亚“暗箱操作”的最突出事例。

南亚各国多领域转型叠加互动程度加深，是造成地区动荡的深刻内因。2024年地区国家转型三大共性表现越突出：

一是经济转型陷入“同态竞争”困境。新冠疫情和乌克兰

危机等因素加速全球产业链重构，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迭代发展使新一轮产业革命日益临近，南亚各国既在传统产业领域承受相互竞争压力与地缘政治冲击，又在新兴产业领域面临掉队落伍风险，经济转型紧迫性与难度上升。但从转型基础来看，地区工业化进程仍任重道远。各国产业结构、发展路径相近，区域内经济依存度、合作水平偏低。在此背景下，各国经济转型恐激化地区内部“零和竞争”。

二是政治转型进入矛盾激化阶段。选举政治与家族制度相结合是南亚政坛最突出特征，但近年来民粹主义盛行，新兴社会阶层对家族政治的不满日益上升，人心思变、矛盾激化，使南亚多国的权力转移过程变数频出。